

# 文学欣赏与评论

浙江省文学学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 文学欣赏与评论

浙江省文学学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杭州

封面设计 陈钧生

文学欣赏与评论

浙江省文学学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83,000 印数00,001—11,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239

定 价：0.65元

## —— 目 录 ——

- |     |                |     |     |
|-----|----------------|-----|-----|
| 1   | 吴敬梓与果戈里        | 平慧善 | 陈元恺 |
| 15  | 文天祥和他的爱国壮词     |     | 陆 坚 |
| 27  | 辛弃疾同投降派史浩的斗争   | 蔡义江 | 蔡国黄 |
| 36  | 陆游《钗头凤》词本事质疑   |     | 吴熊和 |
| 44  | 浙西词派的先河        |     |     |
|     | ——曹溶与曹尔堪       |     | 林 湮 |
| 53  | 论殷夫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     |     |
|     | ——纪念殷夫逝世五十周年   | 肖 荣 | 莽 砂 |
| 76  | 《心防》的艺术特色      |     | 陈 坚 |
| 88  | 鲁迅在《新青年》分裂时的态度 |     | 徐重庆 |
| 99  | 鲁迅研究的第一次宝贵收获   |     | 钱诚一 |
| 107 | “携手相期赴首阳”      |     |     |
|     | ——絮话郭沫若郁达夫的友情  |     | 邓牛顿 |
| 110 | 茅盾旧事拾零         |     | 戈 铮 |
| 114 | 关于巴人同志的死       |     | 欣 荣 |

|     |                              |         |
|-----|------------------------------|---------|
| 119 | 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 飞 白     |
| 135 | 青年一代的悲剧<br>——巴尔扎克《幻灭》人物谈     | 丁子春     |
| 147 | 《巴尔扎克词典》选译                   | 潘文烜译    |
| 160 | 巴尔扎克轶事(二则)                   | 毛信德     |
| 166 | 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一些探讨                | 蒋孔阳     |
| 173 | 普通人的美学<br>——新安江溶洞审美经验的反省     | 张 芝     |
| 192 | 略谈“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              | 李寿福     |
| 203 | 文艺枝谈：黄金 落叶                   | 蔡良骥     |
| 214 | “千载斯人去，风流亦我师”<br>——杜甫诗歌理论的启示 | 马成生 罗仲鼎 |
| 228 | 曹丕“文气说”三题                    | 韩泉欣     |
| 240 | 《读〈随园诗话〉札记》得失浅论              | 盛海耕     |
| 251 | 编后                           |         |

## 吴敬梓与果戈里

平慧善 陈元恺

《儒林外史》与《死魂灵》是两壁交辉、相互媲美的世界长篇讽刺文学名著。吴敬梓与果戈里是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讽刺文学的杰出代表。吴敬梓(1701—1754年)写《儒林外史》，大约在四十岁到四十九岁之间，即1736年到1749年间。大约过了一百年以后，俄国作家果戈里(1809—1852年)写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死魂灵》。果戈里是在1835年到1840年间完成《死魂灵》第一部，后又在1843年到1845年、1849年到1852年间，断断续续写《死魂灵》第二部，并在1845年、1852年两次焚毁文稿。

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首先给予《儒林外史》最崇高最公正的评价是鲁迅。鲁迅说中国文学中有了《儒林外史》，  
“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sup>①</sup>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sup>②</sup>他把《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称作“谴责小说”，以别于《儒林外史》。在俄国文学史研究中，最早对《死魂灵》作充分的评价是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说：《死魂灵》是“一部……有无穷的艺术性，同时在思想方面又很深刻的、社会的、大众的、历史的作品”，它的出现，犹如在“蒸热和旱魃中出

---

<sup>①②</sup>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77页，第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58年。

现爽快的闪电的光彩一样”。<sup>①</sup> 别林斯基曾写了五篇论文，来捍卫果戈里为首的“自然派”，与《死魂灵》所加强的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而鲁迅是《死魂灵》的真正的鉴赏者与杰出的评论家，他又是《死魂灵》的中译本的翻译者。

《儒林外史》与《死魂灵》都享有世界的声誉，同时都为鲁迅所喜爱与充分尊重并不是偶然的。《儒林外史》与《死魂灵》都达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鲁迅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sup>②</sup> 他高度评价《儒林外史》，首先是对它的真实性的充分肯定。鲁迅批评明代的人情小说及其他小说“往往大不近情”，“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已同谩骂”，并将《儒林外史》与之比较。他还说，《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在张汤奉衙门里，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sup>③</sup> 同时，鲁迅还举果戈里的作品作例子，说吴敬梓与果戈里的艺术描写“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sup>④</sup> 别林斯基称果戈里是“自然派”的领袖，称赞他充分逼真地抓住生活中的一切，“从人物的表情直到他脸上的雀斑”，把生活当作一幅“真正的肖象画”。<sup>⑤</sup> 鲁迅与别林斯基赞赏吴敬梓与果戈里的，首先都是不加粉饰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儒林外史》与《死魂灵》的伟大成就在于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与俄国农奴制危机时的否定的现实。《死

---

①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俄文版第288页。

②《鲁迅论文学》第218页。

③④同上第214页。

⑤《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58年。

魂灵》的现实主义的伟大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它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世界文学中著名的讽刺典型。在俄语中，“魂灵”与“农奴”同是一个词。“死魂灵”是指乞乞可夫利用两次人口登记中间有些农奴已经死去，但地主尚未报请注销的机会，向他们廉价购买死去的农奴的名字，冒充活的农奴作为抵押品向政府申请荒地，牟取暴利的投机交易。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生活的主人”——农奴主其实已是行尸走肉，他们的灵魂不早就腐朽了吗？试看乞乞可夫访问的第一个地主玛尼罗夫，他是个使人感到“甜腻味”的地主。玛尼罗夫不大说话，整天只是沉思冥想。什么从屋子里挖一条隧道，或者在池子上造一座石桥，两边开店之类，真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他的书房里放着一本书，是两年前开始看的，可是一直在第十页间夹着一张书签。客厅里陈设着华丽的家具，可是到最后两张靠手椅，材料不够了，只得绷着麻布，四年来，他总是预先提醒来访的客人不要坐上去。旁边一个房间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八年前，玛尼罗夫在新婚后的第二天就对妻子说：“心肝，我们明天该想法子了，至少我们首先得弄些家具来。可是一直一件没有添置。这是个完全溺于莫名其妙的空想，而没有一点能力足以料理实务的，早已丧失生活能力的地主。泼留希金是另一个著名的农奴主典型。他是个怪吝的地主。泼留希金穿着不伦不类的睡衣，“袖子和领头都非常嵬峨，发着光，好象做长靴的郁赫皮，背后并非拖着两片的衣裙，倒是有四片，上面还露着一些棉花团。颈子上围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是旧袜子，是腰带，还是绷带呢，不能断定。”人们一见到泼留希金的服饰，一定会当作乞丐而给他一两个戈比。泼留希金的唯一的生活内容是搜括财富：“凡有在路上看见的，一块旧鞋底、一片破衣裳、一个铁钉、一角碎瓦

——他都拾了去。”凡是他走过的道路，“就用不着打扫了。”别人的东西瞬间就会到他手里，除非把他当场捉住，否则他会以祖宗三代的名义证明那是他的。泼留希金已经陷入十分荒唐的自相矛盾之中，他拚命地积累财富，却不去合理地支配财富。于是“地窖里的面粉硬得象石头一样，只好用斧头去劈下来”，“粮堆和草堆都变成了真正的肥堆，只差没有人在上面种白菜”，“麻布、呢绒、以及手织的布匹，如果要它不化成灰，便千万不要去碰。”泼留希金的怪吝，竟造成了对财富的白白糟踏。就这样，果戈里通过几个农奴主的典型形象，真实地表现了封建农奴制下人性的堕落。《死魂灵》中的“生活的主人”，无论是空想家玛尼罗夫，或是怪吝鬼泼留希金，他们的性格表现都令人恶心。而玛尼罗夫的甜腻腻的“没有性格”的性格，是由农奴主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泼留希金的堕落，是农奴主对农奴的无耻的掠夺与对财富的不可克制的贪婪的结果。归根到底，正是封建农奴制度形成了“生活的主人”们的畸形的思想性格。于是果戈里的《死魂灵》，就成为对于农奴制的深刻揭露与有力抨击。

同样，吴敬梓对现实的揭露也离不开典型的创造。他的讽刺的笔锋是对准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过：“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sup>①</sup>对吴敬梓的人物描写赞叹不绝。《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是个吝啬鬼的典型。他有十多万银子的家财，但是平时舍不得买一斤生猪肉。由于日常生活怪

---

<sup>①</sup>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58年。

吝到极点，他的妻子面黄肌瘦，身体虚弱，积劳成疾而死。他自己得病后，明知死亡在即，可是还“舍不得银子吃人参”，放不下家产，“每晚算帐，直算到三更鼓”。直到临终时，还嫌油灯里点了两根灯草芯太费，从被单里伸出两个指头，要家里人熄灭一根灯草芯，才“把手垂下”断了气。作家通过一系列生动的事例与细节，把严致和的吝啬性格刻划得入木三分。又如马纯上这个八股文的名选家，作家写他游西湖，对优美的自然景色毫无领会，碰见女人慌忙低头不敢正视，看到鸡鸭鱼肉咽唾液，发见皇帝的手书就下跪礼拜，还在丁仙祠内求签问富贵。作家通过这一系列言行的描绘，细腻入微地揭示了这个愚拙迂腐的灵魂。范进是先落魄后发迹的鄙俗儒生。在中举前，他是一个贫穷受辱的老童生。他从二十岁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还没有进学。他“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在十二月的上旬，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乡试回来时，家里已经饿了两三天了。就是因为穷，范进受到丈人胡屠户的百般辱骂。中举的喜讯刺激得他发了疯，胡屠户的一巴掌，才使他惊醒过来。中举后许多人来奉承他，送田产、房屋、银子的不断，两三个月的时间，家里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而实际上范进不过是一个文行俱无的鄙儒。他不知苏轼、刘基是何许人，他写的文章不知所云。在母丧守制期间，他外出打秋风，在宴席上装腔作势，不用银筷象箸，可是虾圆子却拣大的吃。范进遭遇的前与后，他的身份与才德都是鲜明的对照，通过这个形象，作家深刻地反映了科举制下在八股文中讨生活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可鄙的命运和势利熏心、狗眼看人的社会环境。《儒林外史》中人物众多，作家用简练的笔墨，使他们的“世相”活现在读者的面前。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于科举制度腐蚀知识分子的灵魂的情形以及追

求功名富贵、趋炎附势的种种社会相揭露得淋漓尽致。

果戈里在《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中曾经说过：“对象越平凡，诗人就越须要崇高，才能够从中抽出不平凡的东西来，使不平凡成为完全的真实。”吴敬梓与果戈里的描写和讽刺的对象都是很平凡的。但是从平凡的现实中汲取诗情，作家必须有崇高的美学理想。在中国小说史中，《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的差别，除了真实性以外，谴责小说不象《儒林外史》那样闪耀着理想的光芒。至于鲁迅称为“黑幕小说”者，则不加批判地写干坏事的手段，实际成了教人作恶的坏书，则已成为小说的末流了。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曾在《寄怀严东有》诗中写道：“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吴敬梓生活在封建统治的最后朝代，却抱有六代文人的思想情怀，仰慕有《风》、《雅》精神的建安文学，怀念梁昭明太子的孝行。应该特别指出，这里的“六代情”、“建安”等，都不仅指文学方面的，而且表现了吴敬梓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批判态度。所以在这首诗里，程晋芳不仅盛赞了吴敬梓的文采风流，而且赞扬了吴敬梓的不与丑恶庸俗的现实同流合污的独立不群的精神。吴敬梓为了反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的事物，曾经凭借古代的某些信念，但是除了复古的倾向外，《儒林外史》中洋溢着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这点我们从杜少卿、沈琼枝、向鼎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的。唯其如此，吴敬梓的揭露与批判能够击中要害。而果戈里的《死魂灵》第一部也同样。果戈里是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进行写作的。《死魂灵》第一部中的抒情插笔，直接颂扬了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它们大大提高与开拓了小说的美学境界。小说的最后写道：“……俄国呵！你奔到那里去给一个回答罢！你一声也不响。奇妙地响着

铃子的歌。好象被风所搅碎似的，空气在咆哮，在凝结；超过了凡在地上生活和动弹的一切，涌过去了；所有别的国度和国民，都对你退避，闪在一旁，让给你道路。”《死魂灵》第一部洋溢着民族的自豪感与对俄罗斯祖国未来的憧憬。正是这种深厚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支配着作家去揭露世界上丑恶不堪的违反人性的东西。别林斯基说：“《死魂灵》这部作品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在它里面揭露并解剖生活，到了琐屑之处，并且赋予这些琐屑之处以一般的意义。”<sup>①</sup>果戈里的伟大，在于他是从爱国主义思想的高度去分析生活的。所以我们阅读《儒林外史》、《死魂灵》，接触到假、恶、丑的事物会引起极度的憎恶，并且从批判中感受到了诗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更加崇高。

吴敬梓与果戈里不仅有崇高的美学思想，而且有深刻的观察力与表现力。因此他们都善于从庸俗卑微的日常生活中，进行典型化的创造。鲁迅曾说果戈里的创作的艺术特色之一，是写“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sup>②</sup>如果借“平常事，平常话”来评价《儒林外史》，也是合适不过的。吴敬梓表现儒生，就是采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的。如写马二先生游了几天西湖，最后用了《中庸》里写“地”的一句话：“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来赞美西湖的湖光山色，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从而准确地表现了马二先生的迂腐性格和满腹肚糠。鲁迅说：“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sup>③</sup>在科举制的时代，腐儒的言必称孔孟，是日

---

①见《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52年。

②③见《鲁迅论文学》第237页，第2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59年。

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吴敬梓将它们集中起来，用文学的方法加以表现，收到了很好的讽刺效果，表现了作家的敏锐的观察力与出众的表现力。《儒林外史》、《死魂灵》中都没有“大排场”，没有宏大的场面、复杂的情节与激烈的冲突。但是如此深刻而真实地表现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几乎无事的悲剧”。做到“烛幽索隐，物无遁形”，确是难能可贵的。鲁迅说得好：“……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sup>①</sup>因此，对于《儒林外史》、《死魂灵》写“平常事，平常话”，表现“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然而《儒林外史》与《死魂灵》第一部，毕竟是不同民族的作家的创作，它们间又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是在讽刺的特点上，《儒林外史》采用的是“皮里阳秋”的笔法。所谓“皮里阳秋”，即“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看来只是客观与冷静的描写现实，甚至是不加修饰的白描，而作家的热烈的爱憎却深藏在后面。鲁迅说：《儒林外史》“婉而多讽”，也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行文婉曲，但仔细推敲体会，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讽刺。吴敬梓写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后，“不觉那手隐隐痛将起来，……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作品只是平直地叙述，可是对胡屠户却进行了委婉而深刻的讽刺。又如王氏兄弟在未得银子时，两人“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得到大量赠银后，大赞王氏出了“扶正”的好主意，是女中丈夫，王门有幸，还义形于色地拍

---

<sup>①</sup>见《鲁迅论文学》第2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59年。

着桌子说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道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王氏兄弟不悌的劣行昭然若揭。《儒林外史》的某些章节，往往用暗示，有时干脆让读者自己去寻找逻辑的联系。例如不正面写严致和为了停息哥哥官司而破钞的痛惜心情，而是写了一段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的对王氏兄弟的谈话，批评乃兄肉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烧，煮得稀烂；从而使读者自己去体会这个平日只舍得花四个钱给独生子买肉吃的吝啬鬼，在白白送掉几十两银子后，还要办酒席请客的痛楚。因此，阅读《儒林外史》就必须有一定的人生经验才能领会。阅历深者才能体会到作者反映的真实与讽刺的深刻。鲁迅曾说过：“《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①

果戈里则不同，他往往直接地加以辛辣的嘲笑，他含泪地笑，毫不怜惜地揭发到肮脏的卑微的官僚与地主们的灵魂的最隐秘的深处，用锋利的解剖刀，剖开沙皇俄国肌体上的脓疮。作家并不掩饰自己的强烈的憎恶的感情，因此行文中往往采用评述式、有时干脆作家自己闯进去发表感想与意见。例如尽情嘲笑玛尼罗夫的“没有性格”的性格以后，他严肃地指出：玛尼罗夫们与人接触，开始还“招人喜欢”，接着人们就会感到鄙俗与无聊：“呸！这是个什么东西！”在刻划泼留希金的怪吝的性格表现以后，作家感慨万端，他写道：“一个人能够堕落到这样的无耻，猥琐，卑微里去吗？他会变化得这么利害的吗？这还是真实的模样吗？是的，这全是并非不真实的。人们确可以变成这一切！”而在吴敬梓的作品中，这样的评语是找

---

①见《鲁迅论文学》第1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59年。

不到的。最多在第三十二回中，当臧蓼斋诉说补廪、做官的好处以后，杜少卿笑道：“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同为辛辣的讽刺，但是吴敬梓与果戈里又有不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犹如“后劲大”的四川胡椒子；果戈里的《死魂灵》好似辣劲来得快的湖南胡椒。就民族的欣赏习惯说，我们更喜欢后一种，可是在文艺评论上，应该说各有千秋，不必强分轩輊。

其次，《儒林外史》与《死魂灵》第一部的不同，还表现在典型化的特点上。就《死魂灵》来说，是把夸张作为典型化的基本方法。他抓住几个地主与乞乞可夫的性格的某一个本质特征，放在放大镜下面观察与表现，而对于人物性格的其他侧面则略而不顾。例如写玛尼罗夫，突出他的空想，刻划泼留希金，集中写他的悭吝。使得他们的畸形性格十分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成为脍炙人口的讽刺典型。而吴敬梓则不同。在《儒林外史》里，夸张往往只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来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的。例如第二回中，周进长叹一声，头撞号板，昏死过去；范进听到中举的消息，乐得手舞足蹈，发了疯。这一悲一喜，显然用的是夸张手法，它们是被用来表现儒生们热中科举的思想与特定环境中的感情亢奋的状态的。至于周进、范进的性格，并不是只夸张某一点，因此要概括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也不是两三个字能说明的。在《儒林外史》中，人们最熟悉的也许是马二先生。吴敬梓笔下的马二先生，不是一个“匪类”，他热中科举，迂腐、守旧、庸俗。但他能急人所难，在朋友危难之际能倾囊相助，对不相识的人也肯慷慨解囊，不愧为一个血性男子。这个典型人物的创造，运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按生活本身的样子刻划的，是“这个”，而不代表一种“类型”。在讽刺作品与浪漫主义作品

中，夸张往往被作为典型化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易于奏效，但有时难免流于类型化，而吴敬梓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他笔下成功的典型，挖掘得是很深刻的，是足以列入世界文学典型的行列的。

在刻划人物时，两部作品的另一个不同是在处理人与事的关系上面。果戈里表现人物是把他们放在固定的范围内，让他们处于静止的状态中，着重刻划他们的低下的精神世界与卑劣的灵魂。例如写泼留希金是运用环境描写、外形描写、作者述评，以及对乞乞可夫购买死去的农奴的心理反应，他的具体活动与事件是很少的。而《儒林外史》不然，严致和这个怪吝的地主，是通过息讼、扶正、生病、临终等一系列的事件与场景来表现的。范进这个形象是通过院试、借银遭斥、中举发疯、众人奉承、胡屠户两次贺喜、张静斋送银子房屋、母丧期间打秋风等事件，以及在这些事件中，范进与周围人物的关系来塑造的。在理论上，人与事是不可分的。但是作家在进行创作时确实有一个具体的艺术处理的问题。中国古典小说更注重事件的完整的叙述，通过生动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在比较这两部现实主义巨著时，特别要提到的是《死魂灵》第一部几乎完完全全是讽刺；小说中也有颂扬，只是停留于抒情插笔，没有熔铸成艺术形象。而《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成却包括讽刺与颂扬，不仅有大量的反面的追求功名富贵的寡廉鲜耻的儒生，而且有理想人物（王冕）——豪杰（杜少卿）——真儒（虞育德、庄征君、迟衡山）——市井奇人（荆元、王太、季遐年、盖宽）这一正面形象体系。在表现理想人物与四个市井奇人时，作家强调了他们与劳动人民的深刻联系。在刻划豪杰时，不仅写出他们的离经叛道的反理学的倾向，而且渲染了他们与“小人”、“女子”平等交往的特点。杜少卿在南京

手拿金杯，携着娘子的手，同游清凉山，惹得周围人不敢仰视；他对“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又同情逃妾沈琼枝；这些都是与儒家“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说教相对抗的。在不少小故事中，如写卜老爹与牛老儿的友谊，鲍文卿搭救不相识的向鼎时，作家越过封建等级的鸿沟高墙，使读者感受到劳动人民的质朴可爱的品质。让热中功名利禄、不讲文行出处的儒生与劳动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吴敬梓的种种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表现，值得后人景仰。但是《死魂灵》第一部却有明显的局限性。鲁迅曾经指出过：果戈里“……写到农奴，却没有一点可取了，连他们诚心来帮绅士们的忙，也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果戈里自己就是地主。”<sup>①</sup>《死魂灵》中讽刺的乱用，归根到底，由于果戈里囿于地主阶级的偏见。经过比较，可以鉴别。十八世纪的吴敬梓比一百年后的果戈里更加接近人民，更加进步。这是难能可贵之处。

在研究吴敬梓与果戈里的伟大创作的时候，我们还应注意到吴敬梓的现实主义与他的阶级偏见的复杂关系。吴敬梓笔下的追求名利的反面人物以及与儒家规范相左的正面人物是很生动的。但是他主张以德化人，以德育人。把自己当作教育家，于是在《儒林外史》中，他把虞育德（国子监博士）当作真儒，立为楷模。小说的高潮是第三十六回，特别是“泰伯祠名贤主祭”部分。泰伯是周太王古公的长子，孔丘赞扬他三次让位，是“至德”，公祭泰伯祠，就是颂扬礼让之德。虞育德的言行，是主张调和折中的。公祭泰伯祠的参加者中，没有一个富贵中人，但是良莠不齐，有些人品是很低劣的。可见吴敬梓宣扬的就是中庸之道。全书中作家最着力地宣扬自己的理念的

---

<sup>①</sup>见《鲁迅论文学》第2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59年。